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強國之略

战略文化卷

战略文化与安全战略抉择
美国战略文化及其战略取向
欧洲国家的战略文化与战略
亚洲国家的战略文化与战略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及其特色

邓晓宝 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強國之略

战略文化卷

邓晓宝 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国之略·战略文化卷/邓晓宝主编.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65-6678-0

I. ①强… II. ①邓… III. ①国家安全—国家战略—
中国—文集 IV. ①D6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6277号

书 名: 强国之略·战略文化卷

主 编: 邓晓宝

责任编辑: 闫永春

装帧设计: 李 戎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发行) 66737333 (编辑)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26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5-6678-0

定 价: 40.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编委会

主 编：邓晓宝

副主编：夏征难 毛元佑 侯鲁梁 石玉坤

编 委：梁雪美 潘友木 王中兴 王生荣

程亚文 张 羽

前 言

古今中外,国家走向富强,必然要制定和推进强国之略。近些年来,理论学术界积极研讨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课题,为探索和创新强国之略作出了富有成效的理论贡献。《强国之略》丛书,着眼于国家安全战略,从国家利益、地缘战略、战略文化、战略史鉴四个方面,精选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战略研究成果结集出版。

国家利益是制定强国之略的根本准则。《强国之略·国家利益卷》,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历代战略利益拓展与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战略选择,以及外国国家利益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揭示强国之略的深层动因。

地缘战略是抉择强国之略的客观依据。《强国之略·地缘战略

卷》，从地缘战略与制权理论、国际地缘战略历史演进、中国地缘战略历史回顾、中国地缘战略环境认知、中国地缘安全与战略选择等方面，分析强国之略的环境要素。

战略文化赋予强国之略以民族底蕴。《强国之略·战略文化卷》，从战略文化与安全战略选择、美国战略文化及其战略取向、欧洲国家的战略文化与战略、亚洲国家的战略文化与战略、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及其特色等方面，认识强国之略的思想基础。

战略史鉴昭示强国之略的重要规律。《强国之略·战略史鉴卷》，从大国崛起的安全战略抉择、中国历史上安全问题与安全战略、中国历代维护统一的战略策略、中国历代治边方略与战略争论等方面，印证强国之略的历史走向。

能够揭示战略指导规律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持续的生命活力。《强国之略》丛书收录了《中国军事科学》杂志1995年到2011年间发表的部分战略研究文章。《中国军事科学》杂志是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理论期刊，是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军事学核心期刊，是研究战略问题的高端平台。文章作者多为资深专家学者，也有军队高级干部和理论学术研究后起之秀。编者均为原文稿的编审人员。

中国梦是强国梦，强国梦离不开强国之略。丛书适合各级干部特别高级领导干部，军队高级将领和统率机关参谋人员，从事战略研究、咨询、决策和教学的专业人员，关心国家安全和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广大读者的阅读。相信丛书会给读者带来战略理论和战略实践的启迪，对推进强国之略研究有所裨益。

丛书在出版过程中，对各文章进行了编辑修改，但由于各文章发表时间不同、编审人员不同，为了尽量保留原貌，所以书中仍存在问题。对此，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战略文化与安全战略抉择

- | | |
|-----------------------|---------|
| 论战略文化 | 李际均/ 2 |
| 宗教因素对军事战略的影响 | 汪徐和/ 15 |
| 当代世界民族冲突中的宗教心理因素 | 王志平/ 27 |
| 德日两国对待侵略战争罪行的态度为何迥然不同 | 吴学永/ 36 |

美国战略文化及其战略取向

- | | |
|----------------|--------------|
| 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几个基本观念 | 傅立群/ 58 |
| 试析美国当代战略文化 | 赵彦亮 高 嵩/ 78 |
| 美国全球战略的思想文化渊源 | 周丕启/ 87 |
| 美国价值观与安全观之关系 | 许 嘉/ 97 |
| 中美战略文化传统特征之比较 | 张晓军 许 嘉/ 103 |

欧洲国家的战略文化与战略

- | | |
|--------------------|---------|
| 俄罗斯传统战略思维的民族思想文化底蕴 | 梁月槐/118 |
| 英国的文化传统及其战略选择 | 冯 梁/130 |
| 德国军事战略的社会文化渊源 | 戴耀先/148 |
| 纳粹德国侵略扩张战略的思想文化根源 | 彭训厚/159 |

亚洲国家的战略文化与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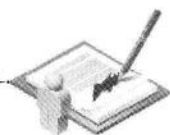
- | | |
|-------------------|-------------|
| 日本战略思维的思想文化脉络 | 张世斌/172 |
| 近代日本的精神文化与国策 | 陈显泗 程卫华/185 |
| 印度的军事战略与社会历史文化 | 孙晋忠/198 |
| 东南亚国家战略思维中的思想文化因素 | 陈显泗/208 |
| 以色列战略文化要论 | 陈振中/228 |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及其特色

- | | |
|------------------|-------------|
| 中国战略文化演进脉络及其价值取向 | 姚有志 钱彦琮/242 |
| 中华民族的战略文化传统及其特色 | 王辛生/268 |
| 近代中国的战略文化走向 | 宫玉振/284 |
| 论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 | 黄朴民 孙健民/296 |
| 毛泽东与中国军事文化 | 谭一青/316 |



战略文化与安全战略抉择



论战略文化

李际均

一、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战略思想最终要汇入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传统文化的烙印，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决定着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入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概括地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战争,对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而又辐射甚广的文化。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臆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

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罔或无威,宁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这反映了一种官僚的保守性伦理,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另一位美国学者马克·曼考说:“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儒家主张:“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的文化可以容纳所有宗教,包括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在内,从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①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入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人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这个比喻不见得确切,但富于文化和哲学含义。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只能继承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

^①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选自《孙中山全集》,第2卷,8页,中华书局,1981。

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战争,对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中国人民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大胸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从孙子兵法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战略文化的光辉代表。

三、普鲁士—德意志号称“思想家的王国”,其思想文化就像普鲁士的黑白旗一样,有着双重的性质。德国的许多哲学家、史学家、军事理论家都曾为侵略扩张的战略文化出力。而德国哲学传统中理性的一面则有助于它对法西斯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认罪……

有人说过,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用的;没有正义的力量是暴虐的。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每个参加者都是天使;在一个残暴的事业中,每个参加者都是野兽。普鲁士—德意志号称“思想家的王国”,其思想文化就像普鲁士的黑白旗一样,有着双重性质。19世纪初,普鲁士遭到外族统治,几近灭亡,又在反拿破仑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溃败,从而掀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在1813

年的莱比锡大会战中打败了拿破仑,争得了普鲁士进而是德意志的新生。与此相应的精神品质是勤勉、忠诚、节俭、清廉等民主性、进步性因素。可以说,19世纪初的德国人还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把生活变成诗歌,又把诗歌变成音乐。但到了19世纪后期,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被异化为“普鲁士精神”,即狂热的崇尚武力和军国主义。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德国的资产阶级是由容克贵族演变来的,而不像法国那样是通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形成的。普鲁士学派所鼓吹的“普鲁士精神”是权力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生活就是战争等观念的混合体。德国的许多哲学家、史学家、军事理论家都曾为侵略扩张的战略文化出力。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问世后所建立的军事学派,也有两重性,前期曾为德国的民族解放和统一服务,后期便汇入到“普鲁士精神”中去了。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青年时期曾是法国大革命的赞颂者。到了晚年,他却站在没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上,把普鲁士家长制国家当做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宣称,德意志人是世界精神的绝对权力的继承者,有权统治其他民族;今日的世界就是日耳曼人的世界,企图在向外扩张中实现他的绝对真理。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理论圭臬。普鲁士侵略扩张时代战略文化的典型代表是特赖奇克,此人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还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60年代以后转为支持俾斯麦的强权政治,成为俾斯麦在历史文化领域的代表。他露骨地鼓吹“铁血道路”和军国主义,他说:“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是铁和血的时代……如果强者压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存竞争的规律。”普鲁士扩张主义文化在当权者中的知音首先是俾斯麦,其次才是毛奇。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统一,接着德国便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时代。德意志所要的是军队的国家而不是国家的军队。这就注定把欧洲变成一个大战场。马克斯·韦伯评论说,“俾斯麦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习惯于让自己头上的大政治家来替他处理方针政策问题”。从俾斯麦被免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威廉时代”,德意志论和地缘政治论的主要代表是尼采和豪斯霍菲尔。尼采鼓吹战争,并预言雅利安人种是统治欧洲的新种族,宣扬极端的种族主义。豪斯霍菲尔则提出,日耳曼民族“有权不顾其他领土所有者的权利”,“谋求足够的生存空

间”。这些观点后来被希特勒搬进《我的奋斗》一书,成为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之一。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共和国的教育中,就充斥复仇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说教。希特勒上台后,更是通过焚烧进步书籍,控制舆论与文化教育,把民众思想纳入法西斯轨道。德国近代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固然有一定的学术贡献,但也有不少是混淆了爱国与侵略的界限,违背了学术道德,滥用学术,为侵略政策制造理论依据,成为法西斯战略文化的制造者,是不能辞其咎的。克塞林说:“在某种情况下,战败较战胜反而能形成更伟大的经验。”1993年,在希特勒篡夺政权60周年之际,德国人在勃兰登堡门前用烛光组成“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字样,就是证明。德国法西斯几乎葬送了德国的文明,法西斯的战败才使德国人民觉醒,挽救了德意志的文明,德国哲学传统中理性的一面则有助于它对法西斯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认罪,从而得到了宽容,也保持了尊严。

四、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的战略文化并没有外部迫使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武士道”的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侵略政策相结合,就把非理性和反人道发展到极端。日本对其战争罪行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它终将不能成为对世界发展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大国……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的国家政策,主要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久便发生了畸变,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19世纪末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贵族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通过御用文化变为社会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然而却是在“王政复古”、“尊王讨幕”的口号下进行的,确立并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教国的国教地位。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

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他和普鲁士的特赖奇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晚年却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而体现这种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名誉等。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真谛，儒教和佛教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日本神道是多神教，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做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主义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使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妇孺达2000万人之多，另有1500万人受伤，尤其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更是令人发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虐杀中体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从其国家政策和战略文化中去找。

日本军国主义这种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的战略文化并没有外部迫使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井上清、铃木正四合著的《日本近代历史》中说：“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

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美国的乔治·弗里德曼和格雷迪思·勒巴德所著《下一次美日战争》中说:“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用这两段话概括日本的近现代史并不为过。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当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但均未得逞。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却是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内混同秘策》的具体化。此后,日本战略文化便非理性主义、法西斯思想横行,出现了被称为军部喉舌的“皇道哲学”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径说成是“世界历史的当为”,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直到日本法西斯灭亡。日本不像德国那样,有众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诗人为它的战略文化效力。对于当时哲学文化相对贫乏的日本来说,“皇道哲学”加上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战略文化。标榜信奉中国佛教禅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寺庙的僧人也不放过,正说明武士道精神对禅宗教义的扭曲和背叛。美国学者克里瑞说,“大家虽然公认禅宗对于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响,但认真研究会发现禅宗对现代日本的影响却几乎没有”,“武士道在精神和实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历史上一向庄严的佛教里掩饰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属于佛教的因素”。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来传入的佛教思想,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仁爱、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却畸变为好战、虐杀、轻生。一棵古老的东方智慧之树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这便是战略文化的分野。而这分野是有深刻的历史和哲学原因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由于哲学的贫困,所以日本难以产生一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发展兵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哲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